



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

蔡昉

共服务供给,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其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有所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开启增长新动能要求对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人力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其三,民生领域存在一些堵点和短板,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覆盖率以及均等化程度有待提高,这些都需要在加大投资于人力度的总体部署下予以破解和补齐;其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方面使投资于人力具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投资于人力使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红利得到分享。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既为投资者确立了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当前,我国就业矛盾发生变化,已经从总量性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回归充分就业常态。这决定了促就业的政策着力点应从扩大就业规模转向提高就业质量,从应对周期性失业转向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

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一部分传统岗位被替代,同时新产业、新业态和平台经济也创造出大量新就业岗位,并相应改变了就业形态,最突出的特点是就业的非单位化。对于传统就业形态,劳动就业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最低工资、劳动合同、集体协商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实施,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都是依托就业单位进行的。这些方面对于新就业形态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应按照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新要求,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水平,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项制度。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一般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就业质量提高,大都是通过劳动力按照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顺序流动实现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在宏观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微观上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就业质量也随之提升。同时要看到,在产业结构变革加速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劳动力反向流动的现象。特别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制造业比重下降、岗位自动化程度提高等情况下,劳动力转移速度会放慢、转移范围会收窄。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就业出现本地化趋势,而不是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中城市。同时,也有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对此,要采取有力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引导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行业流动,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增强对大龄和青年劳动者为重点人群的人力资本供需匹配度。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核心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主要由劳动者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工作经验积累等人力资本培养机制获得。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会造成劳动者技能培养滞后于技能需求更新换代,形成以人力资本供需不匹配为特征的结构性就业困难。这种情况在大龄劳动者和青年劳动者群体中更常见。大

龄劳动者往往因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更新能力和劳动力市场适应力都偏弱,“数字鸿沟”也会进一步扩大他们面临的技能缺口;青年劳动者面对的就业困难,通常在于缺乏工作经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进一步削弱那些技能水平较低的青年劳动者的竞争力。对此,要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帮助重点群体更好适应智能化时代的就业岗位要求。

推动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同步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合理分配,是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和民生福祉改善之源,也是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具体体现。立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应认识到“增收入”不仅包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包括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因此,应从更深更广的层面理解“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的要求,这是推动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政策效能更加显著的前提。

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才能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收入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做大“蛋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12—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5.7%,不仅都实现了合理增长,而且居民收入增速还有所领先。“十五五”时期,无论是有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还是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需要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也对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持续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还需要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3年的2.81:1缩小到2025年的2.31:1。但与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经验相比,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相比,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供需需矛盾突出,扩大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已成为打破消费不足和需求偏弱对经济增长制约的必然要求。这也意味着,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努力能够为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作出贡献。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形成的“涸滴效应”,更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使各方面政策措施产生协同合力。国际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并不足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而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近年来,我国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政策精准性等,推动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持续好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显示出政策理念及其相关措施的关键性作用。

以加强民生建设稳定预期

预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在面对经济环境变化时,心理预期和行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这将相应影响到他们的预期及行为。比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就业和收入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一定依赖,当增长速度变化、发展动能转换时,人们在心理上往往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又如,在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波动之后,居民家庭预算曲线既有平衡受到冲击,家庭财务状况也会发生变化,可能对居民预期和行为产生影响。再如,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复杂激烈等外部环境变化,也会使消费者产生规避风险倾向,影响其预期和行为;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居民预期不稳,使居民消费趋于谨慎。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变化是一种常态,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该也做不到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阻止变化,而应着力降低因变化造成的预期不稳。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应通过统筹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冲各种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应着眼长远加强制度建设,稳定居民作为消费者的预期。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为政策实施和制度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着眼于三位一体的总体要求和统筹考虑,应在以下方面着力。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这项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力资源的供需匹配水平,即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来提升和更新劳动者技能,促进学校教育同工作培训的有效衔接,提升人力资本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就业挑战的能力和水平,并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增长动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和功能完善,畅通劳动力合理流动渠道,提高人力资源供需的匹配水平和配置效率。为此,要转变政府公共服务和支出理念,在提供就业服务和培训、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激励相容机制等领域深化改革。

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环节,推动劳动者工资和居民收入合理增长,推动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报酬分配趋于合理,缩小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实施精准化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整体提高就业质量,实现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显著提高。优化税制结构,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格局,鼓励科技向善、创新向善、智能向善,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强化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积极贯彻落实投资于人的理念,围绕在全生命周期内为全体居民提供更广泛、更高质量、更均等、更普惠的公共产品,实现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推进制度建设。具体包括:完善以提供养老、养育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人口支持政策以及包括养老、助老、银发经济等在内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健全以提供教育、培训、再教育为中心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形成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包括保障性住房政策等在内的其他社会福利体系。(《人民日报》)

理润奇峰

“反向旅游”,是指游客避开热门旅游目的地和人流密集区,转而选择三四线城市、县城、乡村等相对小众的目的地,追求安静、清闲、放松与舒适体验的旅游方式。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首,而旅游正是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十五五”期间,我省拥抱县城“反向旅游”发展机遇,亟待进一步破解有特点缺卖点、有风光缺发光、有客流缺客留等痛点难点,将趋势性流量转化为长效化发展增量。

打造“自带流量”的独特卖点,破解同质化困局。一是锻造地域文化核心标识。引导县域逐步转向软文化、微改造、精提升的精细化运营,深入挖掘独特民俗、绝版生态、独家历史等唯一性资源。可借鉴湘西酉阳“晒秋”等经验,挖掘特色非遗技艺、民俗节庆、历史典故,向有温度可触摸、有深度可沉浸、有回味可珍藏的旅游场景转化。比如,中方县荆坪古村依据学者对“遍地东风”的长期研究进行复原,2025年游客接待量实现大幅提升。二是打造文旅IP独家记忆。综合贵州榕江打造“村超”节庆赛事IP、湖南浏阳打造“龙舟IP”、云南大理借助《去有风的地方》打造取景地旅游IP等经验,支持县域因地制宜,以IP促融合、以融合强产业。三是精准锁定“对的人”。瞄准年轻群体以及来自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消费群体,深入分析该群体追求松弛感、青睐小众独特体验、注重性价比、渴望深度参与、乐于社交分享等消费偏好,不断优化产品供给。聚焦消费能力与闲暇时间兼具的“新银发族”,有针对性地开发温泉疗愈、中医药体验、文化研学、摄影写生等康养旅游产品。例如,宜春县莽山景区针对老年及特殊群体需求,打造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

提升“让人心动”的叙事能力,突破营销传播瓶颈。一是紧扣本地最具有特色的资源与产品。例如,浏阳打造“周末去浏阳看焰火”的城市品牌,助力浏阳跻身年轻人热门目的地选择,本质上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出口。二是策划现象级传播事件,主动设置议题,将本土节庆升级为融合媒体传播、社群互动、线下体验的综合性事件,在短期内集中引发公众关注与讨论。例如,2025年“五一”假期举办的第三届醴陵炒粉节,以“小炒粉”成功撬动消费者对区域“大文旅”的广泛关注;2025年11月,安徽广德市第三期“地锅大舞台”在迎春街举办,随着地方党粉、引流举措叠加网络达人直播形成合力,由地锅、奶茶和桃酥组成的广德“三件套”成功吸引到“大流量”。三是实施精准化营销转化。针对本地、周边、中远程等不同客源市场,实施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与渠道组合。深入分析国内外游客搜索、预订、消费及评价行为等,优化营销内容、传播渠道和促销政策。

完善“主客共享”的服务设施,化解配套服务承载痛点。一是健全旅游交通设施。支持县域开放公共机构停车场资源,建设季节性生态停车场,如衡山县在新建衡山渡街区时,同步设置了永久性和临时性停车场。在停车场与核心景区之间开通电动摆渡车或接驳巴士线路,在风景道沿线、热门景区停车场,以及县城中心、乡村民宿、农家乐等地布局充电桩。二是提升住宿餐饮品质。支持县域发展精品酒店、主题酒店和品牌民宿等,组织开展“县域民宿管家”专业培训,推行全省统一的民宿服务质量认证体系。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模式,强化特色美食街区的全程管理与规范运营。三是完善智慧旅游服务。引导热门县域打造集数据监测、指挥调度、公共服务等于一体的旅游智慧中枢,如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上线“张家界一机游”平台,全面覆盖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各项需求。

优化“不虚此行”的全程体验,夯实管理根基。一是构建“近悦远来”的协同治理机制。倡导政府引导、居民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优化涉旅应急预案,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与实战演练。落实“首问负责”投诉处理机制,实现快速响应与闭环管理。推动“宠客”服务理念转化为全民共识与行动细节,营造温馨友好的城市氛围。二是坚持柔性引才与本土孵化并重。支持县域以柔性引才破解高端人才瓶颈,与旅游院校、职业学院等建立定向培养与合作关系。定期举办覆盖全域旅游规划、数字化运营、服务礼仪、急救安全等领域的专业培训班。此外,还要积极创造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三是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决策与风控机制。引导县域强化前期把关,建立多部门联审与专业论证制度;强化中期监测,对运营项目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实现分类预警与精准指导;强化后期激活,对“困境项目”积极采取资产重组、业态创新及模式转换等方式盘活,对“停摆项目”依法退出并资源再利用通道。

构建“富县富民”的共赢生态,解好开发可持续难题。一是推动产业融合与区域协同。以纵向融合激活本真价值,可参考贵阳市“竹林观光+矿洞探险+工业研学”等模式,将文化体验融入真实生产生活场景。以横向协同优化发展生态,支持县域融入省旅发大会等区域旅游发展布局,专注发挥自身独特文化或生态优势。如衡山县借助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契机,主动与南岳区联动推介“大南岳衡山旅游区”,成功实现南岳里、衡山渡的“双向引流”。二是培育互惠共生的经营主体生态。支持一批根植于本地的文旅企业成长壮大,探索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业资本赋能、在地居民共享”的良性产业生态圈。三是实施县域景区游客承载力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引导县域开展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估,明确热门景区的承载阈值。依托数字化平台,对客流、生态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实现超载自动预警,通过“核心区保护、缓冲区管控、开发区利用”的分区策略,针对淡旺季实施差异化调控。

(《湖南日报》)

推动县域「反向旅游」高质量发展

唐小兵

以引育“新农人”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王志刚 郭莹

粮食安全根基、有效支撑工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新农人”以技术赋能与精细化管理,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升。通过产业结构与业态创新,拓展农业生态、文旅、康养、电商等多元功能,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向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延伸,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实现农业高效率与农村高就业的协同统一。通过带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资源流入乡村,持续优化农村人才结构与能力素质,构建城乡要素良性互动新循环,助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彰显时代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引育“新农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局,构建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科学育才、暖心留才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为“新农人”建功立业提供支撑。

广聚兴农英才,畅通“新农人”引进渠

道。深挖本土人才潜力,重点吸引返乡农民工、大学生、乡贤能人等群体投身乡村建设,建立人才联络站与资源库,精准对接供需。拓宽外部引才路径,推行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候鸟专家”“周末工程师”“科技特派员”等模式,靶向引进农业科技、电商运营、文旅开发等领域紧缺人才。在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新农人”政策倾斜,开辟人才下乡“绿色通道”,吸引各类人才扎根乡村、服务乡村。

分层分类培育,提升“新农人”能力素质。聚焦数字农业、品牌运营等核心能力,推行田间课堂、导师帮带、案例教学等实操模式,让培训接地气、见成效。深化产教融合协同,支持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建科技小院、实训基地等,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强化数字赋能,搭建云智慧教育平台,打造终身学习、随时可学的数字化培育体系。

匡正“数字出官”错误政绩观

韩骏升

心实绩。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衡量党员干部政绩好坏,从来不是看一串数字漂不漂亮,而是看群众的心声有没有人倾听,群众在教育、就医、就业等方面的烦心事有没有妥善解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增强。谷文昌造林治沙、焦裕禄治理“三害”,他们的政绩都不靠数字堆砌,而是写在群众心中,写在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上。走出“数字迷信”,就要把精力放在提升发展实效、增强发展后劲上,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上,挤掉水分,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不能只看总量的增加,更要看结构的优化;不能只盯着显见影的项目,更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真抓实干得来的政绩,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匡正“数字出官”错误政绩观,必须破除虚立

“数字出官”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表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领导干部“为捞取名不借假、玩数字游戏、搞虚假政绩”,并鲜明指出这种做法“害人害己,是要不得的”。数字具有直观、简明的特点,用其考核干部政绩,客观反映实情、服务科学决策,是现代社会治理所需。然而,如果党员干部为求取位升迁,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颜”,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和治理失效的怪圈,其危害不容小觑。

“数字出官”的症结在一个“虚”字。有的领导干部深陷“数字迷信”,把好政绩简单等同于漂亮数字,执念于凭“数字”论英雄,以“指标”量好汉,为此不惜脱离实际搞谋划,忽视规律搞超前发展,只“求显”不“求潜”,只“求快”不“求实”,数字不鲜亮丽,质效却严重“缩水”。然而,虚数撑不起实绩,只会掩盖矛盾,误导决策,浪费财政资源、透支发展后劲。数字与发展实际、群众所感不相匹配,“假把戏”早晚会出现,结果是害人害己。为何要给数据注水?出发点是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根

据不是发展发展的目的,“数字政绩”不等于

实。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党员干部拧紧思想“总开关”,把理论学“常”驻于心,把实绩实效“常”立于行,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真正从思想根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破除“唯数字”“唯排名”倾向,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科学划定“考什么”的目标体系,精准考量“怎么考”的方法逻辑,实现多维数据交叉验证,切实推动从“对数字负责”向“对群众负责”的转变。此外,还要擦亮监督的“探头”,不断完善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各方力量参与的监督体系,对数据造假“零容忍”,让错误政绩无处遁形。

凌空蹈虚,难成事业;求真务实,方能功成。干事创业,靠的是实干,拼的是担当,凭的是本事,求不得半点虚浮。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坚守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守住数字真实的底线,以实打实的业绩交出履职的合格答卷。

(《人民日报》)

(《湖南日报》)